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冷戰終結後，以意識型態為基礎的兩元政經對抗體系逐漸沒落，亞太地區深受全球化潮流的影響，而有經濟合作與安全諮商的後冷戰多元政經體系發展，¹ 爲了尋求一個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環境以利經濟發展，亞洲國家紛紛積極的拓展外交活動，以探索新型區域合作模式，各國所界定的「國家安全」概念亦開始延伸，除了傳統上偏重於軍事戰略的探討，更加入了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更爲多元的面向，而產生了多種不同的後冷戰安全新思潮。其中包括了日本與東協國家所提倡，重視國家內部多層面安全的「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由「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的經驗而來，偏重軍事合作和集體安全制度精神的「共同性安全」(common security)；以及重視概念上的交流，以多邊論壇和二軌機制爲主要手段的「合作性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等相關之安全倡議。² 在多元的安全概念交流下，亞太地區的安全秩序已有另一番不同於冷戰思維的新面貌，雙邊軍事聯盟的對抗性逐漸降低，加上逐漸形成的東亞經貿網絡，維持區域安全與穩定經濟發展成爲了亞洲各國的共同目標，區域秩序走向合作而非衝突的態勢已經顯然可見，伴隨而來的是預防性外交、二軌外交、多邊論壇與多邊安全合作等機制之興起。

¹ 蕭全政，「亞太經濟變遷對兩岸關係的衝擊」，**全球化趨勢下之世界、區域與國家建構**（高雄：高雄大學政法系編委會，2007年4月），頁120。

² 亞太地區近年來安全觀與具體安全安排之相關論述，請參閱以下著作：林正義，**東南亞區域安全體系的研究：理論與實際**（台北：中研院，1998年10月）；陳欣之，「國際安全研究之理論變遷與挑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四卷第三期，2003年7月）；劉復國，「綜合性安全與國家安全：亞太安全概念適用性之檢討」，**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2期，1999年2月），頁20~37；楊永明、唐欣偉，「信心建立措施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6期，1999年6月），頁1~21；張哲銘、李鐵生，「『信心建立措施』概念的回顧與展望」，**戰略與國際研究**（第2卷第1期，2000年1月），頁1~20；李瓊莉，「亞太綜合性安全合作的發展」，**新世紀亞太情勢與區域安全**（台北：政大國研中心，2003年6月），頁165~186。

在後冷戰亞太安全新思維的衝擊之下，中共官方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以作為因應亞太區域形勢變化之對外安全新準則。此新安全觀之提出，代表中共延續自鄧小平時期以來的「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界定，以及和平與合作為前提的區域走向，具體內涵包括通過對話、協商和談判建立互信，解決爭端；建立國際合作機制，以追求共同繁榮的精神，除了拋棄冷戰軍事同盟相互對抗的思想之外，其中可發現中共倡導多邊主義的外交理念，³並將其具體的實踐在「東協區域論壇」與「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機制之上。這顯示中共官方體認到，隨著情勢的變化，若不將傳統上以雙邊為主的外交工作重點轉變為多邊與雙邊並重，未來恐有受制於多邊國際規則而被改造為西方國家的一員之虞。⁴有鑑於此，冷戰後中共的外交政策作法上已有所調整，除了在國家基本安全層次注意到防止在周邊地區出現針對中共的軍事聯盟，或已經存在的軍事聯盟出現針對中共的傾向，主要採取的是「夥伴戰略」，其中的基本環節之一即為全面融入國際社會，具體作法便是展開周邊外交和多邊外交，以獲得中共急需的經濟利益和發展機會。⁵因此，中共在近年來強調要與國際社會接軌，隱含著放棄國際制度挑戰者的意味，期望能夠在穩定的外部環境下讓經濟成長得以持續，而中共「新安全觀」與東協國家所倡議之「綜合性安全」，皆強調綜合性的內在安全觀念，故中共與東協之合作具有概念上的共享基礎，兩者在政治、經貿與安全上的往來關係，有助於各自達成設定的國家利益和目標，可說是一種互利雙贏的局面。

東南亞地區依其地緣特性為中共周邊外交的重點區域，「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外交方針，以及「睦鄰、富鄰、安鄰」的新政策內涵為中共的東南亞政策定下了基調；建構穩定的國際環境，維護區域和平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則構成

³ 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東亞研究*（第 35 卷第 2 期，2004 年 7 月），頁 20。

⁴ 閻學通，*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 3 月），頁 119~120。

⁵ 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俄、日、歐（盟）和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 11 月），頁 330。

了中共東南亞「睦鄰外交」政策的基本戰略觀，⁶ 而中共在 1996 年的東協區域論壇上，首次提出了「新安全觀」的主張，其後中共領導人在多邊、雙邊場合多次呼籲樹立新安全觀，對於多邊合作組織的看法亦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多邊合作成爲維護中共周邊安全與穩定的途徑，通過多邊組織提升中共的地區影響力成爲中共亞洲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⁷ 其最終目的則是爲整體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週邊環境。

雖然在安全合作的領域內，亞太地區在區域安全合作方面進展緩慢，尙未構成一個具有有效規範性的多邊安全機制，而且傳統上中共認爲雙邊對話遠比多邊諮商有效，因爲多邊安全機制會提供西方國家介入中共內政的一個管道，⁸ 但東協區域論壇強調非制度化與共識決的議事規則，並且排除美國的參與，使中共得以解除主權問題和其他國家利益被強制議決的疑慮，並且藉此做爲解決與東南亞國家的爭議的平台，以及提升國際形象的重要宣傳工具。以長期的觀點來看，中共藉由參與區域政經整合的方式，可以在區域相關安全議題的爭執上，將問題交由多邊論壇或機制裁決；並可藉由參與區域多邊機制的議題設定，塑造有利於己的制度環境，以確保在亞洲地區的政經安全等各方面利益不被損害，達成其在區域內兼顧國家利益與大國形象的雙重目標，故與東協國家和其主導的區域組織合作，乃是中共在多邊安全合作領域上的一個重要起點。

有論者指出，可將中共的東南亞政策，視爲中共整體區域戰略的實踐作法，其中最明顯的案例，乃是中共在南海問題上對東協各國的妥協，以及亞洲金融風暴時堅持不將人民幣貶值的政策，此種犧牲部分國家利益而維持負責任形象的策略，或可顯示身處於型塑中的亞洲區域政經體系，中共將自身角色定位於何處的

⁶ 許志嘉，「中國新睦鄰外交政策：戰略意涵與作爲」，**遠景基金會季刊**（第八卷第 3 期，2007 年 7 月），頁 52。

⁷ 楚樹龍、金威主編，**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8 年 4 月），頁 142~143。

⁸ Gerald Segal, "Tying China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urvival*, Vol. 37, No. 2(Summer 1995), p. 69.

一種觀察視角，⁹ 而中共在因應區域政經安全整合之趨勢下，對於自身於亞洲區域角色的再界定，無疑地將進一步地牽動其對外戰略的目標和意涵，加上其與區域政經安全網絡的互賴程度日漸升高，而這是否會使得中共對外戰略的「脆弱度」(vulnerability)亦隨之提升，或是亞太安全整合之發展將被中共所主導，其後續發展值得觀察。

承接前述之背景，本文選擇在亞洲政經安全整合領域上已有一定成果的東南亞地區作為研究主題的理由在於，除了可由此觀察中共多邊外交和機制外交的實踐經驗，並探討此種經驗在中共整體外交戰略上有何意義之外，藉由分析中共在次區域中扮演之角色及政策意涵，亦可探討區域大國對於安全整合進程之相關影響，以做為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二、 研究目的

根據學者研究，探究中共外交決策圈的戰略思想和安全觀，並觀察其在不同時期的演變，有助於解釋中共外交和安全行為的動機。¹⁰ 然而，中共官方的外交指導方針，除了最高決策者的中心戰略思想和國內情勢需要之外，在政策微調上仍不免受到當前區域局勢的影響，¹¹ 故本文將以「中共戰略與安全觀」及「區

⁹ 有學者指出，可從「負責取向」的理念型解釋中共十六大以來的對外政策走向，請參閱：張登及，「十七大前夕評估中國對外政策的走向與前景」，*中國大陸研究中心通訊*（第 15 期，2007 年 9 月），頁 8-12。

¹⁰ 趙全勝將政策延續性視為中共外交政策制訂的象徵性宏觀結構之一，他指出，考察北京如何通過不斷認知和逐步適應而改變對外在世界的看法，有助於理解中共外交政策上優先考慮的變化。詳見：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 年，頁 77~127。金淳基（Samuel Kim）將中共外交系統視為一種金字塔型的結構，從最上層顯而易見與彈性的，到最底層的隱含與不變的，包含了四種程度的變數：第一層：政策（最多變的），第二層：原則（口頭上的），第三層：基本路線（在每五年的黨代表大會上再確認與修正），第四層：世界觀與國家認同（最持續的），這四個過程代表了中共決策過程當中的輸入項。詳見：Samuel S. Kim,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8, 4th ed., pp.9-10。

¹¹ 關於國際因素對於中共外交政策的影響，請參閱：于有慧，「中共外交政策走向與選擇」，*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2004 年 1、2 月），頁 105~124；有關中共對外戰略極具區域性色彩的論述，請參見：陶威廉(William T. Tow)著，高一中譯，*亞太戰略關係：尋求整合安全*，(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 年 11 月)；唐世平、張蘊嶺，「中國的地區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 年第 6 期），頁 8~13。

域安全形勢」兩部分為主要論述重心，最終的結論則希望連結兩者之研究，探討中共東南亞安全戰略之政策意涵，以及對次區域安全合作的相關影響。綜合上述動機，本文的研究方向如下：

- (一) 回顧中共與東南亞各國之歷史互動，討論中共與各國之互動模式在冷戰格局制約下的演變。
- (二) 探討中共後冷戰時期的外交戰略與安全觀，對於「安全」此一概念的界定方式，及其如何體現在中共的東南亞次區域安全政策之上。
- (三) 回顧東南亞地區之安全合作進程，並從軍事戰略、政治與經濟等三方面勾勒東南亞次區域安全體系之組成。
- (四) 探討中共與東南亞安全體系之間的互動，據此分析中共在次區域安全體系中所扮演之角色、行為原則與意圖，及其在次區域安全合作進程上之政策意涵。

第二節 文獻檢閱

一、 中共國家戰略與對外戰略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此一命題在外交政策研究領域上可謂是歷久不衰。國家對外政策的方向，毫無疑問會被國內政治所影響，但問題是，影響的程度與範圍為何？外交政策的形成、持續或改變，決策者對於國內政局的考量是否就是主要的決定性因素？有相當多的學者，將其視為中共外交政策產出上一個先驗性的假設，進而以國家整體發展取向來分析中共外交戰略的源頭。

曾任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的 Susan Shirk，在最新著作中提及，中共也許是一個崛起的強權，但卻是個脆弱的強權，真正會產生危害的，不是其

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日漸成長的軍事力量，反而是中國的脆弱。¹² 此一觀點道出兩個面向：第一，評估中共是否具有對亞太秩序危害的可能性，考量其主觀意圖，和統計其客觀的物質力量同樣重要；第二，中共的對外戰略考量，無法和其國內環境完全切割。根據美國蘭德（RAND）公司的研究計畫指出，目前中共外交政策行為的最重要決定因素為其追求「綜合國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的作為，其目的在於使中共成為一個已開發國家，提昇人民生活水準以及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做好科技工業基礎準備。¹³ 而 RAND 的另一份研究報告亦認為，中共「第二階段策略」將於 2020~2050 年之間實施，北京的領導層一旦認為中共的經濟與軍事發展已達到相當先進的程度，則將會追求更強勢的民族主義目標，而比較不會在乎要維持區域與全球環境的平靜與穩定。¹⁴ 由上述的論述可以發現，目前中共的外交是處於一個較為防守的態勢，在戰略上將會著重於避免與其他大國發生戰爭，以維持國家對外經貿管道的暢通，以及持續性的經濟和科技成長，如此一來，不僅可以提供正在進行中的軍事現代化一個強力後盾，亦可進一步地藉由持續性的經濟成長來維持共黨執政的合法性。

在國家總體發展目標上，中共於 2002 年 11 月舉行的十六大會議，提出了在 21 世紀頭 20 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國家戰略。¹⁵ 對此，大陸學者提出了他們的看法。楚樹龍認為，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的中共外交戰略不是「獨立自主」戰略，而是「和平環境」戰略，即為國內現代化建設創造和保持良好的國際環境，特別是週邊環境的戰略。¹⁶ 唐世平則指出，在過去的 20 年裡（很有可能會持續

¹² Susan Shirk 著，溫洽溢譯，**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台北：遠流出版社，2008 年 5 月），頁 9。

¹³ Zalmay M. Khalilzad 等著，吳福生譯，**美國與崛起中的中共：戰略與軍事意涵**（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1999），頁 3。本書為蘭德公司「空軍計畫」（Project Air Force）的研究報告之一，旨在研究中共的崛起對美國在東亞的地位有何影響，並探討美國應採取何種中共政策，其中並特別強調中共的崛起對於美空軍在塑造環境、嚇阻與作戰方面的意涵。

¹⁴ Michael D. Swaine, "China: Domestic Change and Foreign Policy," Zalmay Khalilzad ed., *Strategic Appraisal 1996* (Santa Monica: RAND, 1996), p. 198.

¹⁵ 江澤民，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上所作的報告，**新華網**，2002 年 11 月 8 日
<http://www.cass.net.cn/yaowen/16da/1.htm>

¹⁶ 楚樹龍，「全面建設小康時期的中國外交戰略」，**中國學者看世界—中國外交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年 1 月），頁 115。

到 2050 年) 中共大戰略的中心目標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為中共集中精力搞發展（經濟、社會和政治）塑造和維護一個有利的環境（安全、經濟和政治）。¹⁷ 時殷弘對於戰略目標的性質提出了他的意見。他認為，中共外交戰略基本目標近年來有很大程度地「經濟化」，旨在維護「經濟安全」，中共對外政策或戰略中傳統的國家安全目標已被賦予了一個具有非常清晰的經濟性質的動機。¹⁸ 楊闖更是明白的指出，中共外交戰略就是要為黨的十六大政治報告提出的中國發展目標，規劃制訂創造良好的外部國際環境和週邊環境的政策綱領。¹⁹

由多數學者的看法可得知，中共在 21 世紀初期的國家整體發展戰略，是以「綜合國力」的提升為首要，故外交和安全戰略也因此目標而配合，塑造一個有利於整體社會、經濟與科技發展的外部環境。縱然有西方學者認為，中共有某種程度的「戰略機會主義」作為，²⁰ 甚至可能並無西方國家所謂的大戰略（亦即結合經濟、軍事與外交政策，以提升國力與安全之整體方案），但 Thomas Christensen 強調，中共缺乏統一之大戰略並非意味中共缺乏戰略目標或安全政策，他認為中共的戰略優先順序如下：政權安全、維護領土完整、在國際舞台上獲得威望、力量和尊敬。²¹ 依照此種說法，在戰略目標順序的排列上，中共與第三世界等開發中國家對於「國家安全」此一概念的界定有著共同的思維，那就是極為重視政權延續和統治合法性的內在性安全領域。也因此，中共安全戰略的內涵，除了延續冷戰時期對於傳統軍事安全的重視之外，也將觸角伸進了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等綜合性安全的範疇之中。

¹⁷ 唐世平，「理解中國的安全戰略」，**國際政治研究**（2002 年第 3 期）。

¹⁸ 時殷弘，「中國的變遷與中國外交戰略分析」，**國際政治研究**（2006 年第 1 期），頁 34。

¹⁹ 楊闖，「關於中國的外交戰略與國際秩序理論」，**外交學院學報**（2004 年 12 月），頁 28。

²⁰ 此處所指的主要是中共對美外交上的策略和作為，詳情請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國際經濟研究院（IIE）著，樂為良、黃裕美譯，**重估中國崛起：世界不能不知的中國強權**（台北：聯經出版社，2006 年），頁 162。

²¹ 國家亞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余忠勇等譯，**2001-02 戰略亞洲：權力與目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1），頁 36。

二、 中共外交哲學思考

中共官方與學者在 90 年代以來有著一個普遍共識，那就是美國霸權所主導的單極國際格局在未來的衰退已然成爲一種不可避免的大勢走向，²² 然而，中共應該以何種策略面對現階段「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則引發中共學者眾多的討論。特別是在如何實現「國際格局多極化」的目標、應否成爲區域中主導各項事務發展的大國、中美關係的界定與交往策略、現階段的外交策略應該著重「韜光養晦」或是「有所作爲」等種種問題上，並未有其定論。經由學者對於應否實踐大國外交的辯論²³ 可以發現，90 年代的中共外交哲學面臨「維護大國形象」和「確保國家利益」這兩個主要核心問題的爭論，究竟要以何者作爲外交思想的優先指導原則，兩種觀點的論述各有其主張：

（一）積極派：「維護大國形象」、「有所作爲」

將塑造大國形象擺在政策目標首位，喻希來和吳紫辰可說是其中的代表。他們認爲藉由世界新秩序與國際格局的界定，中共外交哲學應以理想主義的方式才能配合中共的國情，以同時實現世界多極化與區域一體化的目標。在具體作法上則爲：認真塑造自己的大國形象、積極擴展與西方國家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權對話、成爲東亞地區整合的領導者、積極推動全球政治一體化、在聯合國組織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等。²⁴ 葉自成則認爲，外交戰略和外交意識亦爲決定一國綜合

²²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調查了中國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中國現代國際研究所、解放軍研究單位等政府資助的研究機構，發現學者和分析家們(皆爲中共黨員)有個共同的想法，那就是一個多極化的國際體系正在形成中，美國的國際地位和重要性正在衰退，雖然他們對中共何時能趕上美國，以及 20 年後的差距並未達成共識。詳見：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著，高一中譯，**中共對未來安全環境的辯論**（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 年 1 月）。

²³ 白邦瑞指出，中共的分析家通常不會公開承認有辯論的存在，通常也不會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及其他作家的看法，更遑論會對別人的看法提出批評。若撰文者具有黨員身份，有機會接觸到機密性的黨內部文件，他們的辯論必須在黨的指導範圍內進行。請參閱：白邦瑞著，**中共對未來安全環境的辯論**，頁 6，頁 458。然值得注意的是，在 1990 年代中期後，中共官方已經逐漸放寬了對這類辯論的限制，學者間的論述和官方色彩智庫的意見，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成爲官方政策的輸入項之一。

²⁴ 「理想主義」外交哲學的論述，詳見喻希來、吳紫辰，「世界新秩序與新興大國的歷史抉擇」，**戰略與管理**（第 27 期，1998 年 2 月），頁 1~13；喻希來、吳紫辰，「外交哲學中的人類道德—答張睿壯先生」，**戰略與管理**（第 33 期，1999 年 2 月），頁 94~101。

國力的重要組成成分，他強調，中共應從近代「屈辱外交」的陰影和「受害者心態」中走出，放下「韜光養晦」的戰略思想，在推進世界多極化、解決全球性問題等方面承擔與大國地位相適應的責任和義務，並且在東亞地區的經濟和政治體系的建設上發揮主導作用。²⁵ 時殷弘、宋德星亦以為，中共應以「搭車」和「超越」之戰略思考，作為 21 世紀前期的對外戰略，特別是以東亞大國強國身分參與創設東亞區域多邊安全體制，並在其中參與發揮全面主導作用。²⁶

（二）保守派：「韜光養晦」、「確保國家利益」

相對的，另一派學者對於中共的大國地位採取較為悲觀的看法，他們以現實主義出發，將確保國家利益視為外交政策的根基，並認為中共應衡量自身國力，外交事務發展應採取相對保守之心態以維護自我利益與尊嚴。劉勝湘即以強調結盟的負面影響為前提，認為中共實行大國外交策略，積極融入地區組織的策略操之過急，將有損國家利益，他主張應以冷戰時期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為主，避免出頭，更不應主導東亞事務的發展。²⁷ 張睿壯藉由說明美國歷史上的外交政策以現實主義為根基，理想主義只出現在官方的口號與文件當中或是根本就是用來維護國家利益的工具，強調「道德」概念只能作為「工具」，而不能成為外交政策之「原則」，中共應堅定自主立場，而不應該為了維護國際形象和考慮他國感受而犧牲國家利益。此外，張睿壯亦提出了他對於中共國力的看法，他認為衡量一國經濟實力的數據不應只單單觀察國民生產總值等總量計算方式，也應注意到人均總產值、人類發展指數等數值在衡量綜合國力意義上的重要性，從而不應過

²⁵ 葉自成，「中國實行大國外交戰略勢在必行：關於中國外交戰略的幾點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 年第 1 期），頁 5~10；葉自成，「關於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再談中國的大國外交心態」，**太平洋學報**（2002 年第 1 期），頁 62~66。

²⁶ 從大戰略的理論角度而言，「搭車」戰略意指從國際局勢分布的等級結構出發，以減少自己的行動自由為代價，與一流大國及其國際體制合作，爭取其支持、保護或其他互惠，同時減少或消除來自該大國及其國際體制的威脅；「超越」戰略，是著重於緩解安全兩難和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戰略。時殷弘、宋德星，「21 世紀前期中國國際態度、外交哲學和根本戰略思考」，**戰略與管理**（2001 年第 1 期）。

²⁷ 劉勝湘，「中國實行大國戰略為時尚早：與葉自成商榷」，**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 年第 7 期），頁 76-80。

於高估中共國力。²⁸

雖然喻、吳兩人所指涉之「理想主義」和西方國關理論之「理想主義」有鎖差異，然而，他們提倡應當以大國的身分自居，並與美國合作，共創新的世界體系，此種觀點在張睿壯等現實主義學者眼裡，無非是一種讓渡主權和國家利益的過程，但由此也可看出，在 1990 年代中共官方建構大國關係外交取向的同時，已有相當多的中共學者表現出對中共國力和大國地位的自信，以致於與國際社會共享價值和制度不再如同冷戰時期一般，具有喪權辱國的危險性存在。無論如何，中共學者針對中共是否應自視為大國，並從而進展大國外交，主導區域和國際事務有不同看法，而中共在宏觀的外交哲學思考上的確遇到了抉擇，那就是其是否要為了保持大國且負責任的形象而犧牲部分國家利益，以及是否要採取主動的外交姿態而成為區域整合的領導者？

三、 中共的亞洲區域角色定位

中共在亞洲區域的自我角色定位至今仍為西方學者討論的焦點，儘管中共官方積極塑造中共「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但在中共綜合國力增長和展開軍事現代化的同時，中共是否具有成為區域霸權的意圖和能力，以及戰略目標和手段在時空的遷移下產生了何種轉變，成為學者估量中共戰略意圖的關鍵性問題。大致而言，隨著冷戰結束後的情勢變化，對於中共的亞洲區域角色大致可分為兩種看法，在這兩種南轅北轍的觀點下所描繪出的中共戰略，呈現了相當不同的視點和圖像。以下簡單論述這兩種看法的觀點：

（一）修正型強權(a revisionist power)

1992 年美國從菲律賓撤離在東南亞的最後一批軍隊，加上中共強化南海主權宣示和積極建立遠洋軍力的態度，官方和學者並不掩飾其「反(美)霸」和「世

²⁸ 相關論述請參閱：張睿壯，「中國應選擇什麼樣的外交哲學？評『世界新秩序與新興大國的歷史抉擇』」，**戰略與管理**（第 33 期，1999 年 2 月），頁 54~67。

界格局多極化」的主張，中共因而被西方媒體描述為對區域體系極為不滿，並亟欲改變現狀的行為者，²⁹ 也導致了 90 年代初期的東亞區域研究，學者大多強調中共的軍事擴張意圖及其對區域安全的潛在威脅，此種觀點較偏向於地緣政治以及現實主義典範的思考方式，無疑將中共視為區域內的「修正型強權」或是不滿區域現狀的行為者，認為亞洲區域內各國家行為者對於中共的軍事意圖不可不加以提防，中共在亞洲的經濟崛起，伴隨著成為區域霸權的最終目標。

Avery Goldstein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共在亞洲有三個基本目標。第一個目標就是削弱美國在東亞的勢力；第二個目標是阻止日本發展成為中國在亞洲的強敵；第三是預防東協國家、俄羅斯或印度等較次要的區域行為者向美國或日本靠攏，而危害到中國的利益。³⁰ Ross H. Munro 在 1992 年的文章則認為，崛起的中共軍力將是未來亞洲秩序的最大危險，他指出中共近年來積極自前蘇聯取得先進武器，將顯著提高北京對中國大陸領土以外地區的軍事干預能力，而北京視蘇聯的崩潰及美國自菲律賓蘇比克灣及克拉克空軍基地撤退，為加強其亞太地區地位的最好機會。³¹ Richard Sokolsky, Angel Rabasa, C.R. Neu 等人在一項針對美國與東南亞諸國加強原有軍事合作可能性的研究計畫中提及，東南亞國家對於中共軍事能力的增強及遠程意圖甚感憂慮。³² 這體現於南海問題上，中共以武力為後盾，採取強硬的政策宣示，並不斷提升對南海全境進行武力投射的能力。³³ 此外，共軍於 1995 年強行奪取菲律賓美濟礁，以及 1996 年對台灣的軍

²⁹ Gerald Segal 即認為，「中共是一個緩慢的學習者，但過於熱衷改變改變規則」。Gerald Segal，「東亞與對中共的制約」，收錄於 Hans Binnendijk, Ronald N. Montaperto 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中共崛起**（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2 年 10 月），頁 393。

³⁰ 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s: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3 (August 1998), p. 60.

³¹ Ross H. Mu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 62 (Fall 1992), pp. 10-16.

³² 此項研究計畫由蘭德公司(Rand)所屬單位「空軍研究計畫」(Project Air Force)的「戰略暨準則計畫」負責進行，此研究報告訪問了東南亞多個國家的政府官員與學者，其中包括菲律賓國防大學、新加坡防衛暨戰略研究院、泰國國防大學、印尼國家復興學院等政策暨學術機構。詳見：Richard Sokolsky, Angel Rabasa, C.R. Neu 著，高一中譯，**東南亞在美國對中共策略中的角色**（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1）。

³³ 自 1970 年代以來中共與南海問題的各爭議國發生了多次武裝衝突，詳見：Richard Sokolsky 等著，**東南亞在美國對中共策略中的角色**，頁 2。

事恫嚇，皆讓論者對於中共強硬的態度產生議論，此時，中共進行中的軍事現代化，幾乎與「中國威脅論」劃上了等號。

(二) 現狀型國家(a status quo state)

針對中共亞洲區域角色的另一種看法，則於 1990 年代中興起，這種看法較傾向於自由主義典範和區域整合的思考角度，點出中共在 90 年代中期以來，爲了消除「中國威脅論」所造成對周邊國家的不安，開始積極融入地區性的組織，並尋求與周邊國家的爭議和解，其最終目的是爲了積極參與國際制度，創造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週邊環境。此種觀察視角，無疑是已經將中共視爲致力於維護區域政經安全體系現況的「現狀型國家」。

David Shambaugh 以爲，隨著 1990 年代中期亞洲情勢的轉變，中共拋開被西方圍堵的冷戰思維，開始發展出在亞洲區域的全新自我定位，這主要建立在四個主軸上：(一)參與區域組織；(二)建立戰略的伙伴關係及深化雙邊關係；(三)拓展區域經濟的聯繫；(四)在安全領域中降低不信任和焦慮。³⁴ 許志嘉認爲，由於瞭解到自己身處於一個具有敵意的區域環境，中共便推動四種外交政策戰略以平衡這樣的劣勢，這些戰略包括：促進與俄羅斯及前蘇聯國家的合作、維持對北韓的實質影響力、積極改善周邊關係、努力推動區域合作機制。³⁵ 林文程則從中共參與亞太多邊機制的角度出發，他指出，中共自 90 年代中期開始，推動與潛在敵對國家間的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並與周邊國家從事邊界劃分談判、參與軍備管制與裁軍條約，³⁶ 希望能夠消除周邊國家對於中共的戒心，並傳達給國際社會中共並非區域秩序破壞者的訊息。

³⁴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Winter 2004/2005), p. 68.

³⁵ 許志嘉，「中國新睦鄰外交政策：戰略意涵與作爲」，*遠景基金會季刊*，第八卷，第三期（2007 年 7 月），頁 51。

³⁶ 林文程，「中共參與亞太多邊安全機制之目的與立場」，*中國事務*，第二期（2000 年 10 月），頁 88-89。

爲了具體表現中共融入國際社會的決心，以及表達對現有國際體制的遵循，中共近年來對於國際制度的態度，已經從仇視或拒絕轉而積極參與，並希望藉由參與制度來獲得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大陸學者門洪華認爲，中共積極參與國際制度有下列的核心目標：（一）使得現有國際制度朝著有利於中共的方向發展，爲中共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戰略謀劃創造適宜的國際空間；（二）更好的體現「做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大國」的宣示，打破「中國威脅論」，澄清對中共外交戰略的誤讀；（三）表明自己接受國際制度約束的正當態度，穩定外部世界對中共國際戰略的預期，消除對中共發展的擔憂；（四）促使中共外交更加積極和具建設性，向世界展示中國的傳統思想的魅力和建設性倡議，增強中共的國際影響力；（五）在國際制度體系內維護中共的主權和領土統一。³⁷

兩派學者的著眼點或許互有不同，但經過檢視比較後可發現，中共的亞洲區域角色和戰略目標隨著時空推移而產生了改變。邱坤玄以中共積極推展多邊外交的角度說明了中共戰略的轉折點，他指出基本上中共東亞安全戰略是雙邊主義的模式，但到了 1990 年代中期以後，中共逐漸改變對多邊外交的態度，而中共態度改變的原因在於東亞權力平衡的變化，以及綜合國力提升後對成爲世界大國的自我期許。³⁸ 綜合以上學者之論述，可以確定的是，嘗試將爭議性的問題交由國際制度處理或是暫時擱置，以尋求與周邊國家在政治、軍事與經濟上的合作，另一方面則在國際制度上全面參與，尋求以多邊合作的方式塑造有利中共國家利益的制度環境，已經成爲中共 90 年代中期以來東亞區域戰略的新方向。

四、中共的東南亞戰略意涵觀察

儘管中共在東亞區域的外交和安全行爲上已漸有融入區域機制的多邊行爲傾向，冷戰後中共的東南亞安全政策，與以往傳統的安全政策相比，更爲重視經貿合作與區域經濟整合等較偏向自由主義典範的政策作爲，然而，隨著 90 年代

³⁷ 門洪華，**構建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2 月），頁 262。

³⁸ 邱坤玄，「多邊主義與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多邊外交戰略」，**全球化與中國大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2005 年 12 月。

以來美國在東南亞區域的影響力走向下坡，中共是否具有削弱美國在東南亞影響力，進而取代美國在此次區域地位的戰略意涵？中共多邊外交的新瓶是否仍舊包裝著冷戰零和的舊酒思維？中共東南亞戰略的本質為何？對此學者大致上有以下兩種觀察視角：

（一）地緣政治角度

東南亞地區作為中共周邊區域之一，在戰略意義上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東北亞，以地緣政治角度的學者即從此思考角度出發，探討中共的東南亞政策在整體外交戰略上的意義，在地緣政治上和美國的區域強權角色轉換的可能性，以及東協各國面對次區域外強權的對應政策。

楚樹龍、金威認為，國際社會將中共對東南亞的政策視為中共整體外交政策意圖的表現。³⁹ 在這種態勢下，儘管東南亞是中共挑戰美國區域主導權最有可能實現的一個區域，但中共的文武官員與專家都承認，目前北京既無打算也無能力將美國趕出亞洲，⁴⁰ 甚至無意也不可能在可預見的未來取代美國在東南亞的地位，中共的政策是避免衝突、加強合作，中共當前的和平發展政策的一個傾向便是推動東南亞和區域內的主要經濟合作伙伴進入地區經濟政治合作範圍內，以此來推動這一區域內的和平安全的地區秩序。⁴¹ 因此，在目前區域統合的動力之下，以東協「十加一」與東協「十加三」為目前的主要整合力量，與只能透過APEC 施展影響力的美國而言，中共在區域內的主導角色將日趨明顯，這代表雖然目前美國在東南亞地區藉由反恐和軍事合作仍和東南亞各國具有相當程度的

³⁹ 這個觀點隱含了一個對國際社會輿論的假設，即中共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權力不對稱，會使中共毫無顧忌地展現其意圖。與日本和俄羅斯不同，東南亞各國在疆域、人口、經濟和國家實力方面都無法與中共相比。因此，中共在與日本、俄羅斯、印度等國的雙邊爭端中採取較強硬的態度時，一般不會引起非議；而如果中共對東南亞各國採取類似的強硬態度，則會被視為是中共「霸權主義」的先兆。因此，東南亞成為那些拋出「中國威脅論」的人或國家的試金石。詳見楚樹龍、金威主編，**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8年3月），頁186~187。

⁴⁰ Wayne Bert 著，林芳燕譯，**孰者勝出：美國與中國在東南亞之爭**（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年），頁48~49。Bert亦引述了柯慶生(Tomas Christensen)在廣泛訪談過中共決策者和分析家後所提出的結論：中共的確寧願美國勢力存在於東亞，而不願意見到因為美國的撤軍，而增加了日本行為的不確定性與不可預測的後果。

⁴¹ 楚樹龍、金威主編，**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頁189。

合作關係，且東南亞各國將美國視為攸關區域秩序穩定的一股力量，但冷戰結束後美軍撤離菲律賓、柯林頓政府以強硬的經濟手段強迫他國改善對美貿易條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美國採取消極的態度，完全將協助與支援亞洲的任務丟給國際貨幣基金會與其他國家，以及美國國內對涉入國外事務的程度爆發激烈的口水戰，以上種種都讓人們質疑美國能否繼續保有強大的力量，以及未來能否維持對東亞的經濟與軍事承諾。⁴²

中共在美國勢力逐漸在東南亞地區衰退的同時，採取積極融入東南亞次區域政經安全整合的策略，其「睦鄰外交」方針下的「睦鄰、富鄰、安鄰」等友好政策，雖然讓「中國威脅論」在東南亞已然降低音量，但在安全領域上中共是否將取代美國成為區域安全事務的主導國，則為學者討論的重點。陳欣之從東協的角度出發，指出依照東協式的思考與安全觀，面對一個躍升中的區域強權，正面衝突與圍堵並不是最佳的安全對策，相反地，透過「東協方式」的信心建立措施，將中共納入協商式的衝突解決架構，才是避免東南亞安全威脅的最佳政策。由此可見東協各國仍將中共視為安全上的一大威脅。但他同時也提及，在反制美國主導東亞安全議題的考量上，中共與東協有共同的戰略利益，也是中共願意參加東協區域論壇的原因之一。⁴³ 中共學者李一平亦與陳欣之的看法相同，他認為，東協希望通過加強政治上的對話和安全上的合作，將中共納入地區的合作過程。在地區平衡問題上，利用美、日、印度牽制中共，也利用中共牽制美、日，保持平衡，保持東協的獨立性，建立共同安全架構，避免某一大國對東協事務的主導或干預，從而維持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⁴⁴ 因此可知，東協採取的是「平衡戰略」，並不特別依靠大國，其與中、美在地緣政治上保持等距關係，而中共與東協在區域經濟整合和經貿關係上較美國密切，但美國與東協各國在雙邊軍事合作上較為穩固，此種情形是否在未來東南亞權力轉變的同時發生改變，值得後

⁴² Wayne Bert，**孰者勝出：美國與中國在東南亞之爭**，頁 67。

⁴³ 陳欣之，**東南亞安全**，頁 136-137。

⁴⁴ 李一平，「試析冷戰後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係」，**冷戰以來的東南亞國際關係**，頁 144。

續觀察。

(二) 區域主義與區域治理角度

以此種角度討論中共東南亞戰略的學者，則以區域主義在亞洲的發展，以及中共在此間扮演何種角色，或以區域治理的角度探究中共外交上的轉變，探討中共與東亞區域或東南亞次區域在區域經濟整合與區域治理議題上的合作關係，但這亦涉及了中共在東南亞的區域地位探討。

吳玲君以區域主義的觀點出發，指出東亞的合作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相似，必須靠貿易管道才能擴大合作的動力，以達到功能外溢的結果，並將合作項目由經貿擴散至政治與安全方面，而中共於東亞地區藉由貿易自由化與加入 WTO 的過程中，扮演自由貿易公共財供給者的角色。⁴⁵ 近期對於美國在亞洲經濟地位的研究亦指出，霸權若要保持自身於體系的影響力，除霸權國家的實力外，其提供公共財之意願、和中型強權之互動亦為關鍵；然美國於 APEC 之相關政策與雙邊 FTA 簽訂政策等方面，其產出結果皆對東亞地區中型強權不利，導致美國與東亞各國互動關係逐漸惡化。如此看來，美國於東亞經濟合作事務上之影響力在未來恐難保持。⁴⁶ 根據上述兩項研究顯示，中共在區域經濟整合爭取主導角色上，較美國有利。這亦符合「霸權穩定論」的描述，即霸權國家提供國際機制在經貿、外交或政治上的公共財資源，使得機制持續並發揮功能。⁴⁷ 而這是否代表中共正藉由在區域整合中逐漸擔任起隱性霸權的角色，亦令人玩味。蘇長和則從區域治理的角度出發，認為面對國際政治的轉型以及跨國公共問題的挑戰，中共在外交觀念與實踐領域正悄悄的發生革命，中共外交中的新思維，即是指在多邊制度安排基礎上處理全球與地區公共問題的理念，中共在亞洲的多邊制度外交正在為大中國(Greater China)經濟圈提供制度性的保障，一個以中共為中心的亞洲區域

⁴⁵ 吳玲君，「中國與東亞區域經貿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係」，**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5 期，2005 年 9 月），頁 1~27。

⁴⁶ 許哲維，**美國於東亞地區經濟合作之角色：以霸權穩定理論解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7 月），頁 1~3。

⁴⁷ 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出版社，2007），頁 54~56。

治理模式正在形成中。⁴⁸

五、東南亞安全合作進程之探討

是否採取「相對利益」的觀點來評估安全環境，常常主導各國決策者以現實主義考量，或是偏好以自由主義的思維來進行外交及戰略手段。歐洲在二次戰後由經濟整合走向安全整合，乃至於政治整合的道路，這種新功能主義所指稱的「溢出效應」(spill-over)，⁴⁹ 促成了「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和「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的誕生，除了具有涵蓋全歐洲國家、美國、加拿大的安全對話論壇，北約的支持，使得歐洲共同性安全的概念在軍事合作上具有實質執行力量。而東南亞地區的安全環境，在冷戰終結後，確實有了相當大的改變，因此也使得各國之間的合作模式有了質量上的改變，但對於歐洲安全整合模式能否適用於亞洲，學者多數的意見仍認為東南亞在移植歐洲經驗上有一定的困難程度。

William Tow 指出，亞洲的文化、地理環境與政治生態畢竟有別於歐洲，因此，意圖將這兩個地區的歷史案例連結起來，對於瞭解塑造出今日亞洲的各種力量，並沒有很大的助益。⁵⁰ 林正義亦提及，東南亞國家擔心西方國家藉「共同性安全」的概念來施壓亞洲人權問題，故對歐安會議的移植予以反對。⁵¹ 陳欣之則認為，與歐美強調武力的保障安全觀比較，東協處理安全問題的方式是保守，而且不強調軍事手段的軟性處理方式，並且為各會員國保留了極大的國家主權行使空間，但東協各國都吝於放棄國家的主觀判斷與決策彈性，致使東協淪為東協各國的外交工具，使東協無法在區域安全問題上，發揮集體的力量。⁵² 潘

⁴⁸ 蘇長和，「發現中國新外交—多邊國際制度與中國外交新思維」，*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4期），頁12~16。

⁴⁹ Ernst Hass 發現，凡是經驗過歐洲煤鋼聯盟合作成果的個人和團體，會成為推動進一步歐洲整合的有力支持者，他認為根源在於早先的政策所產生的溢出效果，擴散到其他的領域。Hass 的研究發現，在國家分配利益的功能日漸降低之際，國際組織或是區域組織將是國家不可或缺的對手。詳細內容請參閱：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頁81；轉引自 Ernst Hass, *Beyond the Nations-St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⁵⁰ William T. Tow 著，高一中譯，*亞太戰略關係：尋求整合安全*（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頁1。

⁵¹ 林正義，*東南亞區域安全體系的研究：理論與實際*，頁10。

⁵² 陳欣之，*東南亞安全*，頁40~41。

忠岐則以區域主義的角度指出，東亞區域化的從邊緣到中心的演進邏輯，與歐洲從中心到邊緣的進程不同，歐洲經驗難以直接適用於東亞，然而他亦肯定歐洲經驗亦有可取之處，在必須有效解決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才能順利推進區域安全建設方面，歐洲基本經驗無疑又適用於東亞。⁵³

由上述學者之論述可知，在多邊安全合作的層面上，亞太地區由於範圍的廣闊與行為者的眾多，安全架構的參與者橫跨亞洲、美洲、與大洋洲，加上歷史與文化的異質性，要移植歐盟的集體安全經驗的確有操作上的困難，在合作的層次上無法凝聚成一個涵蓋整體區域的具有實質約束力的國際制度。但李文志指出，在後冷戰時期區域主義的潮流下，亞太安全體系因區域權力結構日趨「亞洲化」，逐漸脫離冷戰時期受制於美、蘇冷戰體系運作的模式，區域安全問題解決的方式與內容，不再片面地依其在全球霸權所設定權力結構的位置而定，而是取決於亞太區域主要強權國家的折衝與安排。⁵⁴ 在此意義下，楊永明、唐欣偉認為，除了本有的雙邊軍事聯盟之外，如要涉及以多邊形式進行的安全合作，多以「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為主要的議題起點。蓋因以這種方式進行交流，是在亞太地區國家政治、社會、文化等差異性，以及過去的歷史糾葛當中尋求對話的空間，期望能夠先擱置具有爭議性的問題，以取得所有參與者的共識作為前提之下，降低囚徒困境所帶來的溝通管道不順暢，以及因誤解所產生的對立。⁵⁵ 而「東協區域論壇」和「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的出現，亦說明了「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可適用於亞太地區。⁵⁶ 此外，黃奎博則從政經連結的角度強調「東協加三」在區域合作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共和日本雖然在東亞合作中身為最有潛力的區域領導者，但若無美國的支持則「東協加三」必然會

⁵³ 潘忠岐，「東亞區域主義與區域安全：進程、困難與前景」，*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14 卷第 1 期，2006 年 6 月），頁 1-35。

⁵⁴ 李文志，「後冷戰時代亞太安全體系發展與台灣的思考」，*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1996 年），頁 30~31。

⁵⁵ 楊永明，唐欣偉，「信心建立措施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6 期，民國 88 年 6 月），頁 1。

⁵⁶ 林正義，*東南亞區域安全體系的研究：理論與實際*，頁 10。

失去整合的效率。⁵⁷ 因此，東協以「東協方式」致力於主導東南亞安全合作的同時，「東協加三」作為東協和區域大國政經整合的平台，其重要性不言可喻，而東南亞等中小型國家與東北亞區域大國之間的政經連結，其發展趨勢亦為未來東南亞安全合作前景的重要問題。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 研究途徑

「新古典現實主義」為本論文主要採取之研究途徑，期望能融合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之長處，以求達成理論對於現實的最大程度解釋力。本論文的問題意識，在於研究中共東南亞戰略與區域內國際制度⁵⁸之互動，亦即國際制度與制度內行為者相互產生何種影響。在內容上則兼論中共之戰略和政策演變，及其相對應之區域體系的變化。此兩個主要的研究方向，就國際關係理論的分析層次而言，中共之戰略和政策演變屬於決策層次和國家層次的分析，對於國家利益之注重和權力增長之因素，較偏向於古典現實主義之解釋範疇；而區域體系之變化則屬於國際層次之分析，其探討系統層次因素對於國家行為影響的由上而下研究方式，則可歸類於結構現實主義之研究領域。

根據學者之研究，雖然新古典現實主義發展至今為時甚短，但已展現具體理論架構和研究成果，它提供現實主義理論一個整合型態的架構，跨越國際體系和外交政策的鴻溝，以及調和實證主義和後實證研究方法的對立。⁵⁹ 在此意義下，

⁵⁷ 黃奎博，「『東協加三』與區域合作：東北亞與東南亞的連結」，*國際關係學報*（第 20 期，2005 年 7 月），頁 93~121。

⁵⁸ 以 Robert O. Keohane 的定義，國際制度包括國際建制、國際組織和國際慣例，是有關國際關係特定領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確規則的制度。詳見：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p. 4.

⁵⁹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一期（2005 年 1、2 月），頁 115。

中共決策者在安全觀和區域安全形勢的認知與評估轉變，將會對中共本身產生戰略目標和利益上的調整和再界定；而區域結構在強權的協調折衝下亦會對行為者的行為產生制約的效果，致使國家在安全行為上跳脫不出結構本身所帶來的限制。前述兩者之結合，即構成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家意圖與動機可變性的強調，以及對於「利益平衡」概念的重視。⁶⁰ 以此種視角出發，中共的安全戰略不僅是因應結構轉變而產生的物質變化，並且具備了其本身對於自身實力和地位的認知與期許的主觀因素，從這兩大方向去理解中共的安全戰略演變，乃是本論文所欲強調的重點和研究方向。

二、 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取的研究方法有二種，分別為文獻資料分析法和歷史／比較分析法，此兩種研究方法將在各章節中交叉運用。

文獻資料分析法是指以系統而客觀的界定、評鑑、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定過去事件的確實性和結論。⁶¹ 本論文主要的文獻和資料來源包括了國內外學者之專書、期刊文章、網路資料、報章雜誌等資料，由於上述資料乃是經由撰寫者詮釋後的產物，具有意識型態、政治立場，甚至是主觀個人偏見的危險，故本論文亦將採取政府機關的官方聲明、紀錄、文稿、檔案、外交公報、國防報告書等原始資料作為分析時的客觀依據，希望藉由上述資料的統整，對於相關議題的討論上能夠兼容並蓄，以列出各方的觀點卻又不失偏頗的方式，歸納出個人的研究觀點和研究發現。

歷史／比較分析法為本論文所採取的另一種研究方法。此種研究法主要是針對某一議題隨著時間變化而發展的形式進行縱貫性的研究，⁶² 焦點則置於同一議題在不同時期的比較上。就本論文的研究主題而言，研究中共在東南亞歷史上

⁶⁰ 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頁 49~50。

⁶¹ 葉至誠、葉立程，**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9 年），頁 136~153。

⁶² Earl Babbie 著，李美華等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時英出版社，2004 年第 9 版），頁 522~530。

的策略演變，有助於對於中共政策上的持續性因素進行分析，並且在此基礎上針對新舊不同的策略進行比較，以此歸納出在中共東南亞安全戰略上的重要因素為何，以及重要程度是否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

第四節 論文架構

在整體的研究架構上，本文將分成六個部分，第一章為緒論，內容為研究背景與目的、相關之文獻探討、研究方法與途徑，以及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等部分。

第二章則是研究主題的歷史回顧，時間主要集中於冷戰期間，內容著重於探討冷戰時期中共國家領導人在安全觀念上的轉變，以及中共在毛、鄧領導下的安全戰略如何具體落實於東南亞政策上，藉由回顧中共與東協各國歷史上的互動，從中整理冷戰時期中共東南亞戰略在不同時期所呈現出來的持續性和變遷性因素。

第三章將時間焦點轉向冷戰結束後，討論中共在冷戰後基於國內外因素所制訂的安全戰略目標，重點將置於中共在此段時期的總體安全利益界定、環境與威脅評估，以及具體的安全戰略內涵為何，探討中共領導人與決策單位對於國內外格局的評估等政策和戰略的輸入項部分，以及安全戰略的具體輸出內容。

相較於第二章與第三章對於中共戰略的國家層次分析，第四章則以國際層次的分析角度，關注東南亞次區域安全合作在冷戰後的制度發展，在內容上將從近年來學界所普遍認定的安全研究領域中，選擇軍事戰略、政治與經貿三個安全領域進行撰寫，以此分析東南亞安全環境中，各個國家行為者在上述安全領域中之合作與形成之機制和制度，以此歸納整理東南亞次區域安全體系上的特徵與發展前景。

第五章所要描述的，乃為東南亞安全合作體系與中共行為者間的互動，亦即

中共在東南亞次區域安全體系中的角色為何，並在區域安全整合進程中造成何種影響。本章將中共的影響評估，分別以中共在軍事戰略、政治以及區域經貿整合這三個主要面向上呈現，並藉由整理中共安全政策及在安全領域上的重要行為，嘗試歸納中共在此地區的安全行為原則與遵循依據，及其對次區域安全體系之戰略意涵。

第六章為結論。本章彙整上述各章節對於中共單一行為者之戰略和政策轉變，及其對整體安全結構影響之描述，並連結單元和結構之特徵以歸納出若干關連性，提供未來相關研究之概念起點和研究參考。